

二十一世紀評論

台灣民主之路 II

民主化抑或民族主義化？ ——從歷史視角觀察台灣政治轉型

吳啟功

台灣的民主化，一直籠罩在二十世紀前後兩期的東亞史和冷戰史的陰影之下。在歷史基因的強大影響下，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呈現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並最終成為民族主義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關鍵的轉折點在於1979年美國與台北國民黨政權斷交，幾個來源不同的民主化動因，於此結合為「革新保台」的訴求，亦即維持政權生存的動力。這股動力，決定了台灣民主化的走向。

一 台灣民主化的殖民和右翼基因

台灣民主的萌芽，源於二十世紀初殖民和右翼兩種基因的植入。1895年，中國簽署《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予日本，台灣政治和知識菁英在進行了有限而短暫的反抗後，部分人逃回中國大陸。日本於6月「始政」台灣後，於1896年8月頒布《台灣住民國民身份令》，允許島上的住民在兩年猶豫期間選擇國籍，除為數不多的仕紳外，絕大多數台灣人基於現實原因留在台灣，成為被日本佔據的土地上的日本國籍人^①。面對日本的強力統治及其帶來的「殖民地現代化」，以及相映之下中國的混亂和貧弱，台灣菁英中的多數人選擇接受日本統治的現實；但面對日本堅持以殖民地的地位和二等國民的身份看待台灣和台灣人，台灣菁英也迫切希望在日本體制內獲得與日本國民平等的待遇。

1920年代是台灣近代政治運動史的發端，其間正值日本國內的「大正民主」（1912-1926）時期。受到俄國革命的影響，這個時期日本出現了左翼社會主義思潮，社會主義者關懷的重心在於階級鬥爭與世界革命議題，傾向以「階級」代替「民族」的話語，鮮少關心殖民地事務，因此對在日本求學的台灣學生

吸引力有限。當時，彭華英、黃登洲、呂磐石等少數受到左翼思想影響的人士，顯然身處台灣留日學生主流政治思潮的邊緣^②。而「大正民主」的主流思潮，是以改善和維護日本帝國架構為前提，在體制內有條件、有限度地容納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理念；在涉及台灣、朝鮮等地的殖民地議題上，這種帶有右派色彩的理念以維持日本殖民統治的穩定和永續為目標，提倡改善殖民地政治。這個思維取向契合多數台灣留日學生的思想需求，成為台灣知識界主流思潮之源^③。

在1945年日本戰敗之前，這股政治思潮的流變具有明顯不同於同期中國大陸政治思潮的特徵，即其中並不包含近代推動中華民族建構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經驗，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抗日戰爭。當這種於近代中國國族建構過程中缺席、又帶有殖民和右翼色彩的民主觀念，於1940年代中後期遇到一方面負有去殖民化、將台灣重新納入近代中華民族國族建構進程的使命，另一方面仍缺乏議會民主和地方自治經驗、以列寧式政黨的組織觀念治國的國民黨政府時，自然會出現激烈的摩擦，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即是這種摩擦所點燃的火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易手之際，島上多數抱有右翼民主理念的人士和少數左翼人士都將作為接收者的國民黨視為獨裁的、反民主的勢力。有趣的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敵手中國共產黨，在二戰前後也以同樣的觀點描述國民黨。「民主」曾經是抗戰期間中共及其左翼盟友攻擊重慶國民政府的意識形態武器。在此過程中，中共報紙《新華日報》數度發表社論，肯定美國的民主精神，藉以凸顯國民黨的不民主、反民主和法西斯色彩。事實上，冷戰初期，「民主」也一度是蘇聯集團國家的招牌（「人民民主陣營」），直到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國家建立穩定的專政地位後，西方世界才換上「民主」的標誌，控制了「民主」的話語權。在國民黨統治台灣的過程中，其外在形象和自我定位也經歷了類似的轉折。

二 國民黨與自由派人士、本土民族主義者的離合

二戰之後，國民黨治下的台灣於冷戰的大背景和「反共抗俄」的政治話語之下進一步右轉，且帶有後殖民的色彩。在這個過程中，來自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和本土右翼民主兼民族主義者（下稱「本土民族主義者」）都一度遭到邊緣化，未能聚集、累積到足以影響台灣民主化走向的歷史力量。

1947到1948年間，國民政府陸續舉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和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以紓解來自中共的政治壓力；與此同時，對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的政治狀態感到不滿的台灣主流知識份子，也將此政治舉動解讀為順應民主政治方向的一步，而且並不反對國民黨加強反共的政治動作^④；國民黨則藉由「二二八事件」的善後，打擊了並非事件主角的左翼勢力。

194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失去大陸，退守到這個不久之前仍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島嶼。面對強大的中共新政權和台灣島上眾多帶有排拒情緒的本地居民的雙重壓力，國民黨政府只能選擇在冷戰中完全站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一邊，將自己定位為「自由世界」的一員，宣示對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有充足誠意，寄望藉此得到美國支持。在台灣內部政治上，國民黨一方面徹底瓦解了本土和來自大陸的左翼勢力^⑤，另一方面部分回應本地民意，推動地方選舉和地方自治，鼓勵私營經濟，推行土地改革，改善財富分配結構，為台灣的工業化作準備。

從台灣本土的線索來看，萌發於1920年代的右翼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對日本殖民當局造成了壓力，殖民政府於1933年制訂〈總督府地方制度改革案大綱〉，在限制台灣人參選及投票資格、保障佔台灣人口6%的日本人控制60%以上議席的前提下，於1935和1939年兩度舉辦地方議員選舉，部分滿足了台灣菁英的願望。國民黨政權遷台後以民主為號召，自然不能從這個民主狀態中退卻，更何況國民黨需要獲得本地菁英的支持，因而於1950年開放縣市議員選舉、縣市長選舉和鄉鎮縣轄市區長選舉，1957年又舉辦省議員選舉，使得台灣菁英逐漸掌握地方層級的政治資源。

從以台灣為統治範圍的國民黨處境來看，國民黨政府的首要目標在於鞏固政權。基於這個目標，它對內強調「中華民國」政權代表全中國的「法統」，以確立國民黨政權作為二戰戰勝國一方統治前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正當性；對外強調自己位於「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前線，利用自由派的思想陣地《自由中國》雜誌，為自己打造「自由中國」的光環，以獲取來自西方的助力。《自由中國》的參與者主要是從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他們基本上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接受西化的系統教育和知識訓練、抱持美式自由民主觀念的人士，來台後很快浸淫在美國「文化冷戰」的營養之中^⑥。值得提及的是，《自由中國》獲得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主導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經費挹注，並由台北美國新聞處(USIS)協助發行^⑦；被視為獨立知識份子領袖的殷海光，其知識來源也主要是台北美國新聞處的出版品^⑧。

然而，1950到1970年代國民黨所面對的政治局勢，並沒有給它留下太多實行西式民主的空間。土地改革、地方選舉和地方自治固然符合部分本土民眾的利益和期待，但也損及殖民時期與日本當局密切合作的「皇民」和地主的利益^⑨，這個利益集團結合地方意識與右翼民主理念，進一步發展出帶有右翼色彩的民族主義，以對抗國民黨政權植根台灣社會的努力。至此，一種高舉本土右翼民主兼民族主義和以台灣獨立為目標的政治訴求日趨成形。來自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則希望改革國民黨的黨國一體政治體制，希望其放棄不切實際的「反攻大陸」口號，將台灣國家化，以「民主政治」對抗「共產極權」^⑩。這兩方面的挑戰，都暗含對國民黨將統治全中國的政治體制直接移植到台灣的合法性之質疑，使得國民黨在充滿危機感的情況下，堅決長期維持威權體制，並壓縮「自由中國」的自由空間。在這個過程當中，極少數左翼人士首當其衝，遭到嚴厲打壓；自由派人士和本土民族主義者也受到壓制。

國民黨遷台後，以雷震、殷海光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基於理念和政治直覺，很早已經敏銳地感覺到將「中華民國」體制與台灣本土政治資源結合的必要性。而縱觀戰後的台灣史，基於「現代化」的信仰，國民黨和自由派從未真正進行去殖民化，並在政治和思想上向日本殖民時期的遺產做了很大的妥協。或者兩者在內心深切體認到，從「殖民地現代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本土民族主義者，是台灣最大的政治資產；欲對抗紅色中國，不利用這筆資產，是不可想像的。

1970年代中後期，繼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的席位後，美國又中斷與台北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舉對國民黨在台灣的生存和統治構成了重大挑戰。面對這個困局，蔣經國在檯面上仍高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在現實中卻更深刻地體認到與曾經有所忌憚的本土民族主義者合作的迫切性。為了政權的延續，他明確告知美國，他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要走民主的道路」，其動機一方面在於繼續獲取西方陣營的資源，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動員台灣島上的政治資源，以對抗北京的統一訴求，維持台灣政治獨立的狀態。當時，傳統的國民黨資深黨員對於蔣經國選擇「偏安」感到憂慮，尚未充分體會到他內心排定的優先順序。

這樣，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與自由派人士、本土民族主義者三方終於找到了最大的共同利益，國民黨以進一步台灣本土化，換取自由派人士和本土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來阻絕北京的統一計劃，乃成為無法阻擋的趨勢。

三 台灣民主的民族主義化內容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台灣社會潛在的最大政治力量，是源自日本統治時期帶有右派色彩的自由民主思潮，這股思潮本能地反對中共和國民黨的「反帝反殖」主張和訴求，同樣本能地排斥染有美國和近代中國色彩的自由派觀念。如前所述，蔣經國確立其本土化、民主化路線後，在美國鼓勵下持續成長的本土民族主義政治勢力，於1980年代以後逐漸佔領台灣的政治陣地。它先從內部瓦解了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進而取代業已基本本土化的國民黨，甚至意圖切斷國民黨與中國的剩餘關聯，確立了台灣的民主化方向和形態，即由右翼主導的、以台灣民族主義為內容的民主化。台灣民族主義的終極目標，當然是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民族國家。

既然是民主化，自然不能排除政治民主的形式，也需彰顯平等、人權等價值，但台灣民主化的日本起源，為台灣式民主做了一系列特殊的標註。

(一) 左、右論述和形象的互換

民主化需要標榜進步的價值。前面提到，源於共產黨思想和組織體系的左派人士，立足中共話語體系中「人民」的立場，使用「白色恐怖」概念來描述

解除戒嚴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措施。在蔣經國於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前後，台灣社會中一些反對國民黨的主流政治勢力，開始廣泛使用左派甚至中共的政治話語，並自封左派。以本土民族主義者為主的反對勢力，也借用左派的核心概念「人民」，來對抗國民黨的「國民」論述；將國民黨定位為「法西斯政黨」，以控訴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本土民族主義者甚至借用左派的「反殖」話語，訴求「去殖民化」，但顛倒原來歷史論述中日本和中國的角色，將接收台灣的中華民國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描述為「外來」的「殖民政權」、「殖民統治」。面對這個「殖民者」，不僅要追求有形的政治獨立與經濟自主，更重要的是「克服心理上的集體自卑感、掙脫殖民時代留下來的文化束縛，進行民族認同的重新建構/呈現」^①。

除此之外，本土民族主義者在扮演反對者和後來作為執政者的角色時，都將自己定位為勞工、基層弱勢社群權益的保障者，以及環保、公平等進步價值的維護者，為自身塑造「左派」的外觀。然而，左派理想與中共理念的危險關聯，使得他們在面對政治事務時，仍然堅守着右派的核心理念。當保護弱勢、勞工的價值，遇到想像中的「國族」邊界，前者就會有所退讓。最顯著的一個例子是，台灣社會並未建立保障大陸移民和外來移工基本權利的意識，在制度和現實中對這些群體存在普遍的歧視現象，不僅與左派理想背道而馳，也並不符合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的價值。然而，由於國際人權評等體系的工具化致使台灣的人權狀況排名居高不下，更強化了本土民族主義者在政治上評估自身時的錯覺。

與此相較，國民黨的革命與執政，一開始是從左派的理想和動機出發的。國民黨於遷台後的威權時期得到實踐三民主義的機會，在民生議題上，土地改革和工業化所造就的相對均富令人矚目。然而，基於對中共的恐懼，國民黨不敢將自己定位為左翼，而將號召基層民眾的話語權直接讓給反對者；同時基於長期當家主政，必須與財富階層合作以促進經濟，因而需要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中與資方妥協，這樣就更無法擺脫之前由中共、現在由本土民族主義者所餽贈的「右派」冠冕；甚至進而接受「外來殖民者」的桂冠而自慚形穢。

(二) 後殖民現象下的民族主義訴求

與上述內容相關，以民族主義為內容的台灣民主化，另一特徵是殖民基因的傳遞。台灣本土地方意識轉變為民族主義的政治心理學機制，其關鍵尚不只在於台灣作為島嶼擁有清晰界線這個外在物理條件，更在於其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對比周邊地區），基於政治母體及其文化油然而生的殖民地優越意識。日本統治所帶來的「殖民地現代化」和有限度的政治權利，以及國民黨遷台之後保留這個現代化進程和政治設計的經驗，是構成並延續這種優越意識的基礎。

由此，台灣民族主義的動機和訴求，既不呈現為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者、被歧視的人民反抗歧視者，也不呈現為政治和文化層面的去殖民化，相反，為維護自我高尚意識和心理上的優越感，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書寫必須回顧日本殖民期間台灣人相對「支那」和「支那人」的優越地位，以及脫離日本統治後依舊延續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的成功經驗，藉以彰顯擺脫中國政治和文化影響的價值與正當性。因此，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加深，勢必帶來台灣去中國化進程的加速。

曾遭受殖民的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都有一種共同的後殖民現象，即當地的民主化都帶有前殖民宗主國的意識形態色彩，殖民式民主價值往往壓制「反帝反殖」的左翼民主價值，一些國家和地區由此走向與反殖民主義相反的右翼民族主義，展開具有右翼色彩的國族建構進程。在現實當中，時下在日本社會中並不居於主流地位的右翼民族主義者，經常表達他們對台灣民族主義建構過程的欽羨，並對比1930至1940年代日本帝國的歷史現場，誇讚台灣保存了真正的日本精神，這種觀察具有一定精確度^②。

本土民族主義者沒有完全否認台灣在傳統文化層面與中國大陸的關聯，但強調在現代化的層面，從歷史經驗、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台灣與現代中國並無關聯。在日本統治的過程中，台灣獲得了與大陸迥然不同的歷史記憶和政治經驗，並建構出與「中華民族主義」既不交匯、也不重疊的另一種民族主義傾向。台灣民族主義的初衷在於不願與中國和中國人為伍，中華民族主義者訴求對台灣的同胞情意結，其得到的回應必然是：台灣與中國，既非血緣上的同族，也非制度上的同道，當然只能是兩個不同的民族國家。

（三）一體兩面的「現代化」和「去中國化」

「現代化」是日本在西化過程中發展出來的重要論述，用以區分「現代文明」和「前現代半文明」。明治維新和甲午戰爭確立了日本主導東亞近代化進程的整個走向。在政治上，它們開啟了東亞、東南亞區域離棄傳統秩序的整個進程，其核心內容即是「去中國化」。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亞洲，「中國」一度成為「落後」、「專制」的代名詞，欲追求進步、追求現代化，必須首先與中國切割。在台灣，不獨本土民族主義有其日本源頭，國民黨和自由派也與日本主導的現代化論述有密切關聯。「現代化」迷思成為台灣各政治勢力與中國切割的動力，因為後者仍在很多方面堅持非西方價值。在預設的日本式「現代化」標準下，中國的制度被判定為「不民主」，因而必須明確劃定與中國之間的界線。

近年來，由本土民族主義思潮主導的歷史敘述，力圖呈現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造就的社會和經濟現代化樣貌，以此論證日本進步的生活方式和「野蠻」、「落後」的中國之間水火不容的關係。這樣的論述也呈現了台灣獨立運動

的動機和起點。日本戰敗後出現的台灣獨立運動，一開始就不加掩飾地表達對中國的鄙視，這種心態迄今仍然是相關主張的社會心理基礎。本土民族主義者在將與台灣人有「遠親」關係的國民黨描述為「殖民者」之際，不願將日本對台灣的統治看作殖民統治，因而直接將「殖民地現代化」等同於「現代化」¹³。

日本式「現代化」的另一內容，是終結傳統政治、實行投票民主。由日本發起、在二戰後依然方興未艾的去中國化運動，目標在於以民族國家體系徹底取代傳統中國主導的「天下」國際政治關係秩序。與形成「天下」秩序的廣袤大陸不同，民族主義體系下的島嶼和半島有相對清晰的界限，島民意識是最近似國族意識的原型，在類似的地域發展去中國化的民族主義，有其先天的優勢。如果說島嶼有着有形的界線，那麼民主則是確認民族國家範圍的手段。因此，由本土民族主義思潮主導的台灣民主化，極度強調在台灣範圍內的投票政治，是區分台灣疆界、確認「台灣主權」的政治和法律過程。

四 民族主義化的民主所呈現的樣貌

眾所周知，台灣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至今在亞洲依然處在前沿。台灣在過去超過半個世紀的過程中，不僅透過土地改革和工業化，造就了相對均富的社會，也逐漸建立起穩定的文官制度、普及的教育制度和公平的兵役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現今台灣社會所享受的制度紅利，基本上源自威權時期；民主化之後，這些制度紅利反而逐漸被消耗，制度本身面臨各類挑戰，威權心態和一些內在理路也被保留下來。

(一) 制度、程序和民主原則遭遇挑戰

十九世紀的西方入侵，改變了亞洲的傳統秩序，也激發了亞洲對西式民族主義的模仿。但不同的人群在與殖民者互動的不同歷史經驗中，發展出形態各異的民族主義和民主想像。中國大陸的歷史轉型和民族主義反抗，在極大程度上依託於傳統中國的基礎，印度支那半島和朝鮮半島的反抗也有類似的情形。

在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夾帶了一些源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農漁社會的文化基因，亦如前所述，隱含了一些日本政治文化的底層因素。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必須依賴美國體系的支持，而日本是這個體系當中的一部分；台灣選擇採用美國民主的形式，但內在仍保留日本政治的重要內涵，這使得台灣式的民主帶有工具化的傾向——依然保留了東南沿海農漁社會對威權統治的期待，以及日本政治文化中崇拜勝利者的心態，相對漠視選舉政治中的程序和是非標準。潛藏在台灣政治基因中的威權心態並沒有太大改變，威權政

治的運作模式依然適用，威權社會的結構只是換了新的方式繼續存在。當然，威權政治所殘餘的一些效率優勢也還未完全消失。

由於「民主」話語往往成為不同政黨的競選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脫離真實社會議題，因此，勝選的一方是否兌現競選承諾，落實民主義務，不再是選民關注的焦點。這就使得當今台灣在民主制度下同樣出現破壞文官制度、干擾司法獨立、偏袒黨派利益、任人唯親等現象。勝選者往往高調主張民主、法治、公平和言論自由，但在現實中僅將這些準則適用於己方，並不推及政敵和被定位為「敵對」的黨派。台灣社會對這些情形也長期抱持高度容忍的態度。

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本土民族主義者本來就無意容忍國民黨的存在。台灣獨立運動一開始即將其政治目標定位為在島內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並拒絕任何代表中國統治台灣的政治力量。因此，民主進步黨（民進黨）等主張和實踐台灣獨立的政治勢力，往往並不打算在民主選舉和議會制度下與國民黨正常競爭、互相監督或分享權力，他們的最高目標是置被視為「外來殖民者」的國民黨於死地。同理，在本土民族主義者眼中，民主權利不適用於來自大陸的新移民，更不適用於居於大陸的「中國人」。他們認為中國的「野蠻」、「落後」，並非源於制度，乃源於血統和文化，不論採取何種制度，勢必仍然無法脫離落後的狀態。這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被賦予了種族階級的前提。

（二）民粹化與多數暴力現象

「民主」的概念在理論上是中性的、普世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但在現實中，民主與左右不同的政治形態、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形態、不同的意識形態組合，發展成為不同類型的民主形式。在台灣民主的內涵裏，「少數服從多數」背後所附帶的「多數尊重少數」原則往往被忽略，從而演變成為多數暴力。

台灣的平均教育程度，迄今仍高於中國大陸，不過，日本殖民時代成功的基礎教育，以及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普及、均質的國民教育，既使得台灣人的知識和技能大幅提升，也造成台灣人的知識獲取來源和知識結構幾乎完全來自官方的政治塑造。這個現象有利於官方和強大的政治勢力掌握話語權，方便殖民當局和冷戰時期統治者為中國和中共塑造邪惡形象，並將其固化。

這個現象進一步影響當代台灣的資訊吸收。相較於資訊仍然受到部分限制的大陸社會，台灣在制度上並不限制資訊的傳播，不過，由於二戰後台灣社會的共識是對中共之惡的反感，因此人們對於了解大陸缺乏興趣，會自動篩檢有關大陸的知識和信息。這樣一來，威權時期的「反共」政治正確，以及民主化之後新的「反中」政治正確，都可以迅速普及。

政治正確普及造成的結果，就是社會獨立判斷能力的下降，這也使得台灣民主化過程中，「仇恨政治」和「政治獵巫」的現象有增無減。在「仇恨政治」佔據相當比例的選舉民主之下，缺乏容忍、妥協的精神，追打「全民公敵」的現象屢見不鮮。少數人的意見和權利無法得到尊重，違背民主制度保護少數的初衷。有人用比較極端的口吻，將台灣描述成「低智商社會」、「理盲、濫情社會」。就個人的觀察，在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和北美，知識份子和社會的獨立判斷能力也在下降，其原因是否與教育制式化和媒體政治正確化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在台灣以至西方社會，乃至中國大陸自身的認知中，大陸是一個封閉的、缺乏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會，相比之下，台灣則是開放的，擁有充分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會。不過，一些往來兩岸的台灣人逐漸發現，這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認知。在大陸，官方的言論限制基本上是制式化而空洞的，知識界乃至社會大眾，事實上生活在一個自創的、與枯燥的官方輿論平行的言論世界中，其多元狀態令人咋舌；具有「反正統」、「非官方」色彩的言論，還會受到受眾的進一步重視和追捧。在台灣，官方並不需要規定言論尺度、封鎖異議觀點，但是包括影音媒體和普通讀者、聽眾、觀眾在內，全社會都自下而上地監視異端言論，參與「政治獵巫」；對不喜歡的言論和觀點，群起「出征」。於是，輿論統一的現象反而日漸增加。

此外，為了爭取選票，本來即屬本土民族主義思潮的政黨，執政後必須進一步討好被自身的民族主義動員所煽動的充滿激憤的選民，其政治主張因而必須進一步民族主義化，於是在不知不覺間，將原本以傳統的「血緣」和「天下」思維看待、對待台灣的大陸觀點，刺激轉化為強烈的民族主義，不斷推動兩種民族主義對決的態勢。

(三) 民主未能成為經濟的助力

民族主義背景下的台灣民主化，也未能有效回應社會的經濟需求。台灣的投票制度當然並非全然無效，在投票制度發揮一定效用的地方和時段，民眾的投票行為在技術上確實產生了政黨和政治人物輪替的效果，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權益也可藉此得到保障。

然而，在台灣式人情社會中，當選的人民代表大多將精力用在選民服務上，包括勾銷交通違規罰單、更換路燈、協助選民購買車票等等；選民家中的紅白喜事，也不可缺席。這樣，各級人民代表中幾乎沒人願意在立法機構中為涉及重大而長遠的公共利益的事務盡心謀劃，因為選民看不到這些努力的即時效果，下次選舉自然只會投票給更「熱心服務」的人。在這樣的「短視政治」、「淺碟政治」文化之下，有遠見的政治、經濟規劃自然遭到逆向淘汰。一個悲哀的現實是，1990年代之前台灣成長的活力，與其說與民主制度的運作正向相關，不如說與威權體制的效率正向相關。

台灣的菁英當然還不會自我催眠。儘管民主制度對人們的催眠效果相當徹底，但它的推動者本身，或許基於了解，卻經常對它缺乏信心。在現實中，民主政府對於極權政府的政治、制度、文化乃至無意識形態色彩的技術，往往抱持深度的恐懼；而應對恐懼的方式，是讓其治下社會的生活進一步政治化。例如，為大陸觀眾熟知的日本乒乓球選手福原愛來台依親一段時間後，數度發表對大陸親善的言論又迅速收回，以避開台灣輿論的攻擊。這類例證，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呈現出台灣民主化的民族主義傾向。

五 中國大陸對台灣民主化的誤讀

對於日本式和美國式民主的陌生，使得部分大陸政治菁英只能從自身的習慣和喜好來解讀台灣民主化。中共的宣傳部門曾於1980年代拍攝以「台灣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為主題的紀錄片，以羨慕的態度，向黨員和民眾解釋台灣經濟奇迹的源頭。這種理解其實源自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目的是為當時的改革開放路線和國家統一目標提供佐證，背後所缺少的，是對殖民主義、後殖民現象和殖民地民主化過程的理解，也缺少對甲午戰爭與二戰之後東亞、東南亞地區普遍的去中國化現象的理解。

在韓國，戰後去中國化進程較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更為激進，但韓國社會一度仍以漢學修養來界定階級地位，這使得中國以為文化可以成為中韓之間的橋樑。類似的是，自1980年代末兩岸恢復民間來往後，部分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人物也競相到大陸尋根祭祖，這個現象成為大陸解讀兩岸關係的重要切入點。但在台灣，這種行為只被視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本土民族主義者認為，在傳統文化層面，台灣容或與大陸有關；但在現代化的部分，台灣與現代中國無關。大陸以為可以用「天下」秩序的結構涵蓋與大陸有血緣連結的台灣，但台灣所尋求的是以民主化的形式完成民族國家化；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國族塑造的過程。面對台灣以民主化為外觀的民族主義，大陸的「親情牌」和「讓利牌」自然無法發揮效力。

台灣的民主化在大陸知識界的眼中更一度呈現了一種美好的形象：台灣保留了中華文化，且以華人社會唯一成功的民主實踐，證明中國人可以依普世價值行事。其實，在超越國界的「普世」話語的表象下，不少大陸知識人仍然保有早期「天下」秩序之下作為「天下中心」的心態，只是原先美好而優越的「天下中心」已變成萬事皆不合理的「問題中心」；台灣乃至西方，成為反襯這些不理想狀態的「美麗鏡像」、「美麗他者」。在他們的想像中，大陸流失的傳統文化在台灣得到了完整傳承，台灣的「民主自由」正是大陸「專制」的對立物。

從後殖民理論的角度看，殖民主義的受害者絕不僅限於台灣。孫中山有關中國為「次殖民地」、中共對中國近代史的「半殖民地」評價，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現代中國與殖民主義的關聯。戊戌維新以來，中國主流知識界有意

拋棄中國傳統文化，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但結果是，他們破壞了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和外在形式，卻保留了傳統文化中與民族主義相悖的「天下中心」心態；他們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但核心內容不是西方制度運作的內在機制與深層原理，而是以破除傳統東方秩序和價值為目標的殖民文化，在思想上實踐「自我殖民」。這個扭曲現象所造成的結果，使得近代的中國大陸與台灣在民族主義的發育程度上出現差異，大陸的民族國家建構進程長期滯後。台灣在殖民和民主化經驗中，逐漸培育了具右翼色彩的民族主義；大陸則安於「天下中心」的狀態，抑制這種民族主義的發展。

今天大陸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領銜人物，基本上是1977到1989年期間接受思想哺育的人，他們似乎重複了戊戌維新和五四運動的知識與思想建構過程。多數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西方政治和民主制度的知識與理解仍然有限，對境外的事物鮮有分辨能力，只能用大陸政治當中的民主與民生議題，以及台灣和香港反對派在檯面上運用的民主話語去理解台灣和香港的反中政治，無從解讀其背後的右翼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背景。

大陸與台灣非同步的民族國家建構進程，妨礙了大陸知識界對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民族主義現象的理解。近年來，大陸知識界出現非民族主義化、去民族主義化，乃至「逆向民族主義」的現象，就是「天下中心」和「自我殖民」心態的混合產物。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詭異現象是：在台灣，將台灣當作一個國家來愛的人很多；而在大陸，將中國當成一個政權去恨的人也很多。

六 小結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民主化的議題，與其說是民主與非民主議題，不如說是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期東亞歷史上，日本主導的民族國家體系與中國曾經主導的傳統「天下」秩序之間衝突議題的延伸；是冷戰與後冷戰時期，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與東方傳統秩序、去殖民化新秩序之間衝突議題的延伸。既然其中沒有普世利益，當然難有普世價值。

中共、自由派人士和台灣的本土民族主義者，均先後感受到理想層次的、「普世」的民主，在實踐上有窒礙難行之處。抗戰後期，中共已經深刻體認到「革命」與中國母體之間無法切斷的關聯，在建立國家政權後，這種感受更加直接而強烈。雷震、殷海光這樣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者，同樣不得不同歸國家主義，希望依附在台灣這個實體上去實踐其理想。1980年代後期的國民黨，事實上又重複了雷震和殷海光的思想足跡。與自由主義者相比，台灣本土民族主義者則自始即將民主視為達成民族主義目標的工具。

台灣的民主化，從萌芽的那一天起，就不是單純的民主議題，它見證了地方意識、殖民經驗、政權存廢等複雜因素，這些因素集結在「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這個理由下，使得台灣逐步走向民族主義化。

註釋

- ① 1895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第五款規定：「割讓給日本國之土地上住民，欲至割讓地以外的地方居住者，得在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二年的猶豫期間內，自由變賣所有產業，退至界外。但期限屆滿之後尚未遷離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台灣總督府另於1896年8月頒布《台灣住民國民身份令》，第五條規定台灣人民可於1897年5月8日前自由離開台灣。依據殖民當局的統計，最後選擇離開台灣的住民以仕紳為主，共有6,466人，約佔當時台灣總人口的0.23%。參見王泰升：〈日本統治下台灣人關於國籍的法律經驗：以台灣與中國之間跨界的人口流動為中心〉，《台灣史研究》，第20卷第3期（2013年9月），頁59-61、63。
- ② 有關大正時期日本左翼思想對少數台灣留日學生的影響，參見陳翠蓮：《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台北：衛城出版社，2013），頁17-19；〈大正民主與台灣留日學生〉，《師大台灣史學報》，第6期（2013年12月），頁77-79。
- ③ 陳翠蓮：〈大正民主與台灣留日學生〉，頁68、85-86。有關大正思潮對台灣知識界的普遍影響，參見張修慎：《大正時期以降の台灣知識人における「祖國」「近代化」と「回歸」という思想》（台北：翰蘆圖書，2015）。
- ④ 例如吳濁流在魏道明到任台灣省主席後的觀察：「魏主席到任後，一連地有國大選舉、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的選舉，縣市議員也轟轟烈烈地舉辦過，幾個熱鬧場合下來，人心被捲進去，言論的取締也不算挺嚴厲，隱隱地透露出正在朝民主政治的路上走的迹象，只有『紅色』檢舉與大量徵收稻穀的工作，絲毫未見放鬆。」參見吳濁流著，鍾肇政譯：《台灣連翹》（台北：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232。
- ⑤ 在源自台灣本土、1945年後整合到中共體制的台灣左翼菁英當中，一部分人如謝雪紅於「二二八事件」後逃往大陸，一部分人如簡吉、鍾浩東、郭秀琮、呂赫若等，加入資深台灣籍中共黨員蔡孝乾主持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多數人在1950年蔡孝乾變節後，與中共潛伏於國軍的地下工作人員數百人同遭處決，林書揚、陳明忠等則繫獄數十年。
- ⑥ 有關「文化冷戰」的研究，參見Frances S.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2000)。有關「文化冷戰」與台灣思想文化的研究，參見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國文學報》，第52期（2012年12月），頁221-42。
- ⑦ 林淑慧：《旅行文學與文化》（台北：五南出版公司，2015），頁247。
- ⑧ 出自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台灣重要學者潘光哲的研究。潘先生的研究尚未發表，謹此致謝。
- ⑨ 有關台灣土地改革及其後果的相關研究，參見瞿宛文：〈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8期（2015年3月），頁11-67。
- ⑩ 有關雷震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政治主張的研究，參見薛化元：《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台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9）。
- ⑪ 施正鋒：〈由後殖民的觀點看台灣獨立運動〉，「戰後六十年學術研討會——後殖民論述與各國獨立運動史」（台北：台灣國際會館，2005年5月21日）。施正鋒是「去除中國殖民統治」文化論述的主要理論家，相關著作參見施正鋒：〈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載台灣歷史學會編：《國家認同論文集》（新北：稻香出版社，2001），頁14-80；《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2003）；《自我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追尋》（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2013）。
- ⑫ 日本右翼民族主義者的相關觀察，參見小林善紀著，賴青松、蕭志強譯：《台灣論——新傲骨精神》（台北：前衛出版社，2001），頁250-57。
- ⑬ 參見戴寶村編：《台灣歷史的鏡與窗》（台北：國家展望基金會，2006）。